

大台北地區已婚者婚姻衝突因應 行為之年齡與性別差異研究

李 良 哲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探討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年齡與性別差異。以大台北地區301位已婚者（110名年輕成年人，90名中年人，101名老年人；150名男性，151名女性）為研究對象。受試者接受結構式問卷的個別訪問以回答當他們面對時常發生的嚴重婚姻衝突事件時所採取的各種因應行為的程度及一組問卷。

Oneway 共變數分析用來探討經過統計控制與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有相關的人口統計變項與其他的研究變項後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年齡與性別差異。結果顯示出年輕成年人比老年人採取較多自我責難的因應行為，但使用較少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女性比男性採取較多爭執的因應行為，但採取較少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

關鍵詞：婚姻衝突因應行為、婚姻衝突認知評估、社會支持、婚姻滿意程度、年齡差異、性別差異

*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84-2413-H004-010）成果報告之部分內容。承蒙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鍾思嘉教授對本研究之共同主持與建議及研究助理鍾瑞玫小姐之協助收集與整理資料，特致謝意。

* 感謝審查者對本文討論部份的修正建議。

壹、緒論

個人面對壓力情境時，大多會採取行動或改變想法去處理該有壓力的情境，使其不至於傷害自己的身心狀態。解決或適應壓力情境時所採取的行動或想法的改變，一般稱之為因應行爲（coping behaviors），它是壓力歷程中重要的一部份。

基於因應行爲是個人處理特殊的壓力時所採取的特殊行爲反應，而不是一致且泛情境的(persistent cross-situational)行爲反應（Pearlin & Schooler, 1978），即個人面對不同性質的壓力情境會產生不同的因應行爲。因此，最近的研究者乃傾向於針對某一種特殊的壓力情境下（而不是針對泛情境壓力下）來測量受試者個人的因應行爲。婚姻衝突之所以被選取做為本研究中的特殊壓力情境，乃是因為婚姻生活是成年人主要的生活型態，夫妻之間的衝突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婚姻關係多多少少都會有過嚴重或輕微的衝突經驗。

因應的觀念在 18、19 世紀已有學者多所談及。到了本世紀中才有研究者對其進行研究，最近二、三十年來有關因應行爲的觀念多有改革，有關因應行爲的研究大量出現。最初研究者把因應行爲視之為個體內在的心理歷程（intrapsychic process），此內在的心理歷程係用來保護個人的生理、社會與情緒的功能。例如 Freud（1946）及 Haan（1977）將因應行爲與防衛（defense）混為一談，他們將因應與防衛視為一種對內在衝突的潛意識反應（unconscious response）。在這種觀點之下，研究大都在探討因應行爲與自我防衛機制（Vaillant, 1977）或人格特質（Haan, 1977）間的關係。但是，一些研究發現因應行爲與自我防衛機制之間並沒有可靠而顯著的關係存在。同時，人格特質本身並無法適當的預測個人實際的因應行爲（Fleishman, 1984；Magnusson & Endler, 1977）。因應行爲與人格特質或個體內在的心理歷程之所以沒有明顯的關係存在，其問題可能是由於人格特質與個體內在的心理歷程只是有關個人內在的資源而未考慮到個人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能力可以改變個人內在與外在的壓力源。因之，最近的因應行爲觀念包含了個人為了處理壓力源而採取的認知上與行爲上的反應（Lazarus & Folkman, 1984）。Lazarus 和 Folkman（1984）把因應行爲定義為「個體為了處理超過自己所擁有資源的內、外在需求時所做的不斷改變的認知和行爲上的努力」。這個定義把因應行爲視為為了減低壓力所表現出的認知上與行爲上的努力，而且這些努力的方式會隨時間而有所變化。因此，因應行爲不是個人所擁有的不變的特質或行爲方式，它是會不斷的改變，它是一種歷程。因應行爲包含了處理壓力情境需求的思想（內在行爲）和行動（外顯行爲）。這些思想與行動不是為了改善困境就是為了管理煩惱的

情緒。改善困境的因應行為稱之為問題中心的因應行為（problem-focused coping）；管理煩惱情緒的因應行為稱之為情緒中心的因應行為（emotion-focused coping）。

因為因應行為被定義為個體認知和行為上的反應，所以因應行為可視為意識（conscious）的反應，它能夠直接由個體自我報告（self-report）中顯現出來。一些實徵性的研究已經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可使用於泛情境的因應行為類別（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Endler & Parker, 1990；Feifel & Strack, 1989；Folkman & Lazarus, 1985；McCrae, 1982；Stone & Neale, 1984）。這些因應行為的分類是基於個體處理各種不同壓力情境的行為是一致的與穩定的假設，但一些因應行為的研究者對這種假設抱著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因應行為的研究應該針對特殊的壓力情境，探討在該壓力下採取那些特殊的認知或行為上的活動以減輕該特殊壓力情境所產生的緊張狀態。因之，在本研究中，婚姻衝突因應行為乃是被定義為在婚姻衝突的情境中所採取的特殊活動，它是用來減少婚姻問題或減低婚姻關係的緊張。這些婚姻衝突因應行為包括逃避、爭執、自我責難、自我興趣、正向解決與尋求社會支持。

至於因應行為的有效性，理論上常常有傾向於認為某些因應行為比另外一些因應行為具有正面的效果，其實這種理論上的看法有待進一步探討。這說明了某些因應行為是不是能有效的解決問題情境其實是見仁見智的，它的有效性可能決定於所採用的效標是那一種。Menaghan（1983）指出有各種不同的效標可以用來做為決定因應行為的有效性，這些效標有個體知覺的有效性、長時間後的身心健康與社會功能的評估等。同時 Menaghan（1983）發現使用某一種效標評估因應行為有效性的結果會不同於使用其他的效標來評估因應行為的有效性。短時間內有效的因應行為，時間久了以後也許是不好的因應行為。某種因應行為能有效的解決某一特殊的問題情境，不見得能解決不同的壓力情境，例如 Pearlin 和 Schooler（1978）研究指出解決非人際關係的壓力，如經濟、職業壓力，最好採取心理上忽略問題的因應行為；相反地，解決人際關係的壓力，如親子衝突或婚姻衝突的壓力，最好採取繼續人際關係溝通的因應行為。無論如何，Folkman（1991）認為因應行為是複雜的行為歷程，它們包含各種的個體內（intrapersonal）與個體間（interpersonal）的行為策略，它們可用來解決問題與調節情緒。個體間且問題中心的因應行為被認為是較主動、適應或有效的因應行為；而個體內且情緒中心的因應行為則是較被動、不適應或無效的因應行為。Menaghan（1982）探討婚姻問題與因應行為之間的關係，他指出以退縮或認命的行為來應付不愉快的婚姻關係，事實上會增加婚姻的不

愉快關係，但是以溝通或協商的行為來應付不愉快的婚姻關係卻會減少以後的婚姻問題。這個結果基本上與 Folkman 的說法是一致的。退縮和認命反應了個體內且情緒中心的因應行為，它們對個體的身心福祉有負向的作用；協調和溝通反應了個體間且問題中心的因應行為，它們對個體的身心福祉有正向的功能。在本研究中，正向解決與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反應了個體間且問題中心的因應方式，因之在本研究中將它們視為主動、適應或有效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但逃避、爭執、自我責難與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反應了個體內且情緒中心的因應方式，因之在本研究中將它們視為負向、不適應或無效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

在探討人口統計變項與因應行為之間關係的研究大部分都著重在因應困難情境的年齡差異。與年齡有關的因應行為改變可以從發展的（developmental）、情境的（contextual）與氣質的（dispositional）觀點來加以解釋。發展的觀點認為因應行為會隨年齡的增長而有先天性的改變，也就是說，因應行為的變化不是環境決定的，而是與年齡的大小有關。發展的觀點對因應行為與年齡有關的主張有二種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年紀老的人比年輕成年人使用較多不適應、原始性與無效的因應行為（Guttman, 1974；Pfeiffer, 1977），例如老年人變得更具有敵意、逃避事件與自我中心。第二種看法認為年紀老的人比年輕成年人採取較多成熟、適應與有效的因應行為，以處理所遭遇到的困境（Vaillant, 1977），例如老年人使用較多的協商、樂觀與尋求支持的因應行為。情境的觀點認為因應行為之所以有年齡的差異，是因為各種年齡的人所因應的壓力情境不同所造成的。因此，如果不同年齡的人因應相似的壓力情境則不致於有年齡的差異存在。氣質的觀點認為因應行為與人格特質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人格特質在成人期具有高度的穩定性（Costa & McCrae, 1988, 1989；Siegler, George, & Okun, 1979），所以因應行為在成人期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說，在成人期各階段中，因應行為沒有年齡差異存在。

一些最近的橫貫性的研究支持發展的觀點，它們發現因應行為有年齡差異存在。一些研究指出老年人傾向於使用適應的因應策略處理困境（Irion & Blanchard-Fields, 1987；Labouvie-Vief, Hakim-Larson, & Hobart, 1987），同時老年人也較使用不適應的因應行為如逃避、忽視、敵意反應與自我責備等。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結果指出年輕成年人比老年人使用較多有效的因應行為（Folkman, Lazarus, Pimley, & Novacek, 1987；Quayhagen & Quayhagen, 1982），年輕成年人使用較多的問題解決與尋求協助的因應策略。

無論如何，有一些研究結果支持情境的與氣質的觀點，它們指出因應行為沒有年齡差異存在（Billings & Moos, 1981；Folkman & Lazarus, 1980；McCrae,

1982; McCrae, 1989)。McCrae (1989) 從事一項有關因應行為探討的縱貫性研究，並將其結果與他自己進行的有關因應行為探討的橫貫性研究 (McCrae, 1982) 加以比較。McCrae 指出橫貫性研究結果顯示一些因應行為有年齡差異，但這個結果在縱貫性的研究中並沒有被驗證。這些結果說明了年齡本身對因應行為的變化不具有決定力。橫貫性研究所得到的因應行為有年齡差異的結果也許是代 (cohort) 間差異的緣故，因為在橫貫性研究設計中年齡的效果無法排除代間差異的效果。高再測相關的結果證明了因應行為的穩定性，也就是說，因應行為具有個人特質的成份。

因為因應行為的研究者們在研究時使用不同的因應觀念與因應量表，同時，研究中所指的壓力情境不相同和受試者的年齡範圍頗有差異，這些因素使得各研究結果甚為紛歧且難以互相比較。Folkman (1991) 綜合有關因應行為年齡差異的研究結果指出因應行為呈現共同型態。年輕成年人比老年人似乎使用較多互動的 (interactive) 因應行為，如情緒的表達、訊息的尋求和協商；但是老年人比年輕成年人似乎使用較多個體內的 (intrapersonal) 因應行為，如疏遠、選擇性忽視與內省。Costa, Zonderman 和 McCrae (1991) 則強調與年齡有關的壓力源污染因應行為有年齡差異的結果，一旦考慮壓力情境性質對因應行為的影響後，因應行為將呈現因應行為沒有年齡差異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因應行為是對於特殊壓力情境的特殊反應，而且因應行為受人格傾向的影響比受成熟的影響來得大。

有一些理由可以用來支持因應行為有性別差異。第一個原因是社會經驗 (social knowledge) 有明顯的性別差異，這些差異對個體處理壓力情境的方式會有重要的影響 (Cantor & Kihlstrom, 1987)。第二個原因是與因應行為和人格特質有相關有關。McCrae 和 Costa (1986) 研究發現外向性 (extraversion) 與多採取理性的行動、正向思想與自制的行為有關；開放性 (openness) 與幽默行為有正相關，但與宗教信仰有負相關；神經質 (neuroticism) 與很多不適應的因應策略有關，這些不適應的因應策略如敵意反應、一廂情願的想法、被動、逃避、幻想、自我責備與六神無主。既然一些研究指出男、女性在神經質、操控性、自尊心、精熟性、依賴性和特質焦慮有差異存在 (Maccoby & Jacklin, 1974)，那麼兩性在因應行為應該也有差異存在。第三個原因是男、女性在性別角色上有所差異，以性別的刻板印象來看，男性被視為較具有工具性與能力成就有關的行為，而女性則較具有情感性與人際取向的行為，也就是說男性比較問題解決取向，女性則比較情緒發洩取向，因此兩性在因應困境的行為取向也應該有所差異。

根據以上的理由，因應行為的性別差異應該很明顯，但很奇怪的是很少研究去

探討這個問題，大概是「此地無銀」吧！事實上從少有的幾個有關研究發現因應行為的性別差異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樂觀。Pearlin 和 Schooler (1978) 探討在婚姻、子女教養、家庭經濟與職業壓力下因應行為與性別的關係，他們發現因應行為與性別的關係並不明顯；選擇性的忽視是女性使用最多的因應行為，而男性則使用較多自我依賴的因應行為。Billings 和 Moos (1981) 研究發現因應行為與性別有顯著但薄弱的相關。男性比女性有較多主動、逃避和情緒中心的因應行為。Stone 和 Neale (1984) 研究發現男性喜歡使用直接的行動，但女性使用較多宗教信仰、情緒發洩、放鬆、分散注意力與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Endler 和 Parker (1988) 指出女性比男性明顯的使用較多情緒中心和逃避的因應行為。Bowman (1990) 在探討婚姻因應方式的研究中指出女性使用較多爭執、自責與自我興趣的因應策略，但男性使用較多逃避的因應策略。由以上的研究大約可以看出女性在處理困難情境時傾向於使用被動的情緒中心因應策略，如情緒的發洩；相反地，男性似乎喜歡使用問題中心的因應行為且比較主動的處理面對的困境。

因應行為年齡與性別差異的研究大多沒考慮壓力情境性質與其他與因應行為有關的因素會污染研究的結果。基於以上對因應行為年齡與性別差異的探討，為了瞭解因應行為的年齡與性別差異，研究必須考慮擴大受試的年齡分佈範圍 (Folkman & Lazarus, 1980)，同時，排除其他可能影響因應行為的因素 (如人格特質、壓力情境的性質、個人對壓力情境嚴重性或可控制性的主觀知覺) 以進行因應行為年齡與性別差異的探討是必要的 (Costa et al., 1991; Irion & Blanchard-Fields, 1987)。綜覽國外探討可能影響因應行為與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有關因素，除了年齡與性別外，筆者 (Lee, 1993 ; Lee, 1994) 把這些因素歸納為婚姻滿意程度 (Menaghan, 1982)、人格特質 (自我尊嚴、樂觀性與精熟性) (Carver et al., 1989; Elliott, Trief, & Stein, 1986; Holahan & Moos, 1987)、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的可獲得性與社會支持滿意程度) (Fondacaro & Moos, 1987; Thoits, 1986)、婚姻衝突情境的認知評估 (嚴重性的評估與可控制性的評估) (Carver et al., 1989; Folkman, 1984)。Lee (1995) 以美國東部某大學城附近 197 位已婚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在婚姻衝突特殊情境下的因應行為，在控制其他與因應行為相關的因素後，發現老年人比年輕成年人更可能採用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但較少採用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女性比男性採取較多的爭執、自我責難、自我興趣與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以大台北地區已婚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在控制其他與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相關的因素後是否有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年齡與性別差異，其結果將可

做為文化差異之比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性別、年齡層、及教育程度為主要考慮的人口變項，在大台北地區選取樣本。抽樣的過程係在臺北市十二個行政區之東、西、南、北四大區中，每大區中隨機抽取一個行政區（松山區，萬華區，文山區，士林區）及臺北市鄰近的臺北縣都市化程度較高的縣轄市中隨機抽取中和市及新店市為取樣次母群體。因之研究之次母群體

包括台北市四個行政區，及臺北縣二個縣轄市。然後根據各行政區及縣轄市的人口總數及比例，訂出各區之樣本人數。第二階段的抽樣在上述已選取之六個地區，在每地區隨機抽出三個里，每一里再隨機抽出三個鄰為原則，如抽樣樣本數不足則再抽取更多鄰數。凡是在這些鄰的戶籍資料中，夫妻雙方均存且登記於同一戶內者即為本研究可能之樣本對象，但夫妻中只以一人為受訪對象。決定所欲訪問之鄰里後，至各戶政事務所取得相關鄰里資料，依據性別各半，年齡層（25—45歲，45—65歲，65歲以上）三分及年輕成年人（25—45歲）、中年人（45—65歲）的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上，老年人的教育程度為初中以上的原則選取受訪對象，並抄取所需樣本名單及地址，以資聯絡受訪意願之根據。所抄錄之名單共為1200人，以為充足有受訪意願者之準備。本研究係以結構式問卷進行家庭個別訪視（interview）調查，為提高受訪者合作度及問卷回收率，當受試者完成訪視調查後，致贈受訪者一份小禮物以為感謝。本研究共成功訪視301位受試，全部受試樣本依地區、性別及年齡區分如表一。

表一 受試樣本依地區、性別、年齡區分人數表

	中和市		新店市		松山區		萬華區		文山區		士林區		總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5-45歲	12	12	9	9	6	7	8	7	8	7	13	12	110
45-65歲	11	12	8	7	7	8	6	7	6	6	5	7	90
65歲以上	14	12	7	7	6	7	7	7	7	8	10	9	101
小計	37	36	24	23	19	22	21	21	21	21	28	28	
總計	73		47		41		42		42		56		301

本研究全部受試樣本共 301 位，包括 110 位年輕成年人（平均年齡為 37.34 歲），90 位中年人（平均年齡為 51.96 歲），101 位老年人（平均年齡為 70.41 歲）。全部受試樣本及各年齡組別樣本的人口統計資料描述於下。

在全部受試樣本（N=301；150 位男性，151 位女性）中，平均年齡為 52.80 歲，平均接受教育年數為 12.62 年，平均結婚年數為 25.29 年，平均擁有子女人數為 2.62 人。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全部受試樣本，根據他們的全家年平均收入、教育程度、職業綜合評估，係屬中產階級。大多數的受試皆是第一次結婚，身體狀況良好，宗教信仰以佛教、基督教與無信仰居多。

在年輕成年人樣本（N=110；56 位男性，54 位女性）中，平均年齡為 37.34 歲，平均接受教育年數為 14.25 年，平均結婚年數為 10.25 年，平均擁有子女數為 1.78 人。

在中年人樣本（N=90，43 位男性，47 位女性）中，平均年齡為 51.96 歲，平均接受教育年數為 13.96 年，平均結婚年數為 24.89 年，平均擁有子女數為 2.46 人。

在老年人樣本（N=101，51 位男性，50 位女性）中，平均年齡為 70.41 歲，平均接受教育年數為 9.62 年，平均結婚年數為 42.04 年，平均擁有子女人數為 3.69 人。

二、研究測量量表

本研究係以結構式問卷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進行家庭個別訪視 (interview) 以收集研究資料。研究所使用的結構式問卷包括人口統計資料量表、自我知覺量表、婚姻因應量表、婚姻適應量表與社會支持量表。茲將各量表的內容詳述如下。

人口統計資料量表 (Demographic measure)

人口統計資料量表要求受試回答他們的性別、年齡、接受教育年數、職業、與現在配偶的結婚年數、現在的婚姻狀況、擁有子女數、是否接受過婚姻輔導、健康狀況、宗教信仰與全家平均年收入。同時，受試也回答他們配偶的年齡、接受教育年數、職業、婚姻狀況與宗教信仰。

自我知覺量表 (Self-Awareness Inventory)

自我知覺量表係綜合三種測量所組成，分別測量受試之自我尊嚴、樂觀性與精熟性三種人格特質。

(一)自我尊嚴測量 (Self-Esteem measure)

本測量係譯自 Rosenberg (1965)所發展出之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該量表包含 10 個題項。自我尊嚴量表被廣泛使用以測量受試的自尊程度，並被證明頗具有信度與複合效度、區別效度 (Rosenberg, 1979)。Lee (1993) 以此量表施測於 197 位成年人，指出其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72。在本研究中，為了避免回答反應心向 (response set)，10 個題項平均分散於自我知覺量表中，分別為第 2,5,8,11, 14,17,20,22,24 與 25 題，其中第 5,14,17,22,24 題為反向計分題。受試對每一題項的敘述回答李克特 (Likert) 四點量表以表達他對該敘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在本研究中，以全部受試樣本的資料進行此測量之信度考驗，經過第一次信度分析、各題目間相關 (item-item correlation) 與各題目與校正後總分相關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分析，刪除第 22 題 (因刪除後會增加信度係數) 後再進行第二次信度考驗，得到此測量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alpha = .81$ 。因之，本研究自我尊嚴變項之測量只包含自我知覺量表的第 2,5,8,11,14,17,20,24 與 25 等九題，得分愈高表示自我尊嚴愈高。

(二)精熟性測量 (Mastery measure)

本測驗係譯自 Pearlin 和 Schooler (1978) 所用來測量成人對象精熟性的題目，該測量包含 7 個題項。這些題目用來評估個人認為生活是能由自己所掌握的或由命運所決定的程度。經過因素分析發現各題項負荷量 (item loading) 由 .47 至 .76 (Pearlin & Schooler, 1978)，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75 (Folkman, Lazarus,

Gruen, & DeLongis, 1986)。Lee (1993) 以這些題目施測於 197 位成年人，指出其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75。在本研究中，為了避免回答反應心向，7 個題項平均分數於自我知覺量表中，分別為第 1,4,7,10,13,16 與 19 題，其中第 1,4,7,10,13 題為反向計分題。受試對每一題項的敘述回答李克特 (Likert) 四點量表以表達他們對該敘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在本研究中，以全部受試樣本的資料進行此測量之信度考驗，經過第一次信度分析、各題目間相關 (item-item correlation) 與各題目與校正後總分相關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分析，刪除第 19 題 (因刪除後會增加信度係數) 後再進行第二次信度考驗，得到此測量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alpha = .72$ 。因之，本研究精熟性變項之測量只包含自我知覺量表的第 1,4,7,10,13 與 16 等六題，得分愈高表示精熟度愈高。

(三) 樂觀性測量 (Optimism measure)

本測量係譯自 Scheier 和 Carver (1985) 的生活導向量表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該量表包含 8 個題項。LOT 用來評估個人生活態度的樂觀程度，它顯現出適當的內部一致性、重測信度、複合效度與區別效度。Scheier 和 Carver (1985) 的研究指出 LOT 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76，重測信度為 .79。Lee (1993) 以此量表施測於 197 位成年人指出其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76。在本研究中，為了避免回答反應心向，8 個題項平均分數於自我知覺量表中，分別為第 3,6,9,12,15,18,21 與 23 題，其中第 6,15,18,23 題為反向計分題。受試對每一題項的敘述回答李克特 (Likert) 四點量表以表達他們對該敘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在本研究中，以全部受試樣本的資料進行此測量之信度考驗，經過第一次信度分析、各題目間相關 (item-item correlation) 與各題目與校正後總分相關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分析，刪除第 3 題 (因刪除後會增加信度係數) 後再進行第二次信度考驗，得到此測量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alpha = .65$ 。因之，本研究樂觀性變項之測量只包含自我知覺量表的第 6,9,12,15,18,21 與 23 等七題，得分愈高表示樂觀性愈強。

婚姻因應量表 (Marital Coping Inventory)

本量表係譯自 Bowman (1990) 於研究中使用的婚姻因應量表及有關尋求社會支持的 5 個題項所組成。在此量表的最後並有要求受試者對婚姻衝突事件加以評估的四個問題。

有許多一般性的因應量表被設計出，並在研究中使用 (如 Carver et al., 1989; Feifel & Strack, 1989; Folkman & Lazarus, 1985; McCrae, 1982; Stone

& Neale, 1984)，但因應行為很明顯的是會隨所因應的情境不同而不同，因此一般性的因應量表如果能改進為特殊性的因應量表，將更能有效的測量出受試在特殊情境中遇到困難時的因應行為。基於此，Bowman (1990) 設計出婚姻因應量表，其特殊之處在於題項的陳述係針對夫妻解決衝突行為所可能採取的方法為主。

婚姻因應量表的題項係 Bowman (1990) 根據對已婚者的開放式訪問結果。並參考文獻描述及其他因應量表所編寫而成。經過因素分析及項目分析結果顯示該量表的內容包括五個因素：爭執 (conflict)、自我責難 (introspective self-blame)、正向解決 (positive approach)、自我興趣 (self-interest) 與逃避 (avoidance)。此五個因素形成五個分量表，共包括64個題項。五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由 .77 至 .88。爭執分量表 ($\alpha = .88$) 包含 15 個題項 (2,7,10,14,17,25,27,32,37,41,44,50,54,59,62)，反應出繼續衝突、批評、諷刺與報復的行為。自我責難分量表 ($\alpha = .88$) 包含 15 個題項 (4,6,9,16,18,23,29,33,36,40,47,53,57,60,63)，反應出憂慮、自責、煩惱與睡眠或健康的困擾行為。正向解決分量表 ($\alpha = .82$) 包含 14 個題項 (3,11,13,19,22,26,35,39,43,46,49,52,56,64；其中 19, 22 題係反向計分題)，反應出身體親密、有樂趣、共同參加活動與共同回憶美好往事的行為。自我興趣量表 ($\alpha = .82$) 包含 9 個題項 (5,12,20,28,30,34,42,51,58)，反應出增加不與配偶一起從事的獨自活動。逃避分量表 ($\alpha = .77$) 包含 11 個題項 (1,8,15,21,24,31,38,45,48,55,61；其中 1,15,48,55 題係反向計分題)，反應出拒絕與壓抑感覺的行為。

尋求社會支持是一種重要的婚姻因應行為 (Ilfeld, 1980; Pearlin & Schooler, 1978; Menaghan, 1982)，它在 Bowman 的婚姻因應量表中被忽略了。在本研究中 5 個 (65,66,67,68,69) 反應尋求社會支持的題項加進量表中。因此婚姻因應量表共包含 69 個題項。在本研究中，為了避免受試的回答反應心向，相同分量表的題項平均分散於整個量表中，而不是相同分量表的題項集中在一起。受試對每一題項的敘述回答李克特 (Likert) 五點量表，以表達他們面對婚姻衝突情境時實際採用每一題項的方法或反應以處理該衝突事件的程度。

關於婚姻衝突因應行為實難由觀察中獲得。基於當一個人被問到他／她如何因應某一種特殊壓力情境時，他／她的反應很可能呈現他／她的人格傾向 (Folkman & Lazarus, 1980)。一種比較適當的方法是要求受試者回憶他／她們最近發生的壓力情境，並回答對該壓力情境的實際因應 (actually cope) 行為，而不是提供一個一般性、假設性的壓力情境讓受試者去回答 (Folkman & Lazarus, 1980)。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因應量表即根據此原則設計回答指導語。在量表的指導語中要求

受試者回想一件他／她與現在的配偶相處時會一再發生衝突、爭吵的事件，並加以描述出來，然後，請受試者回答實際採用每一題項的方法或反應以處理該衝突事件的程度。

在本研究中，以全部受試樣本的資料進行此量表各分量表的信度考驗，經過第一次信度分析、各題目間相關 (item-item correlation) 與各題目與校正後總分相關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分析，各分量表中如果發現有題目被刪除後會增加信度係數、與分量表其他題目相關太低或與校正後總分相關太低的話，則加以刪除後再進行第二次信度考驗，其結果如下：爭執分量表刪除第 14 題，Cronbach's $\alpha = .88$ ；自我責難分量表無刪除題目，Cronbach's $\alpha = .85$ ；正向解決分量表刪除第 19, 22 題，Cronbach's $\alpha = .89$ ；自我興趣分量表無刪除題目，Cronbach's $\alpha = .78$ ；逃避分量表刪除第 38, 48 題，Cronbach's $\alpha = .53$ ；尋求社會支持分量表無刪除題目，Cronbach's $\alpha = .80$ 。在本研究，各分量表中被刪除的題目反應不予計分，在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分別表示爭執愈多、自我責難愈多、正向解決愈多、自我興趣愈多、逃避愈多與尋求社會支持愈多。

在婚姻因應量表的後面有四個問題，這四個問題涉及受試者對婚姻衝突事件認知評估 (cognitive appraisal) 的初級評估 (primary appraisal) 與次級評估 (secondary appraisal)。初級評估係受試者自己評估該婚姻衝突的嚴重程度或壓力程度，次級評估係受試者自己評估對該婚姻衝突的可控制程度。

問題一與問題三係有關受試者對婚姻衝突的初級評估 (壓力大小或嚴重性)。問題一要求受試者針對他／她所描述的一再發生的衝突事件，回答他／她面對該事件當時，所感覺到壓力大小的程度，在 0 (沒有壓力) 到 8 (壓力非常大) 的九點評量表中選擇一個數字代表主觀感覺的壓力大小。選擇的數字愈大表示主觀感覺的壓力愈大。問題三要求受試者針對他／她們所描述的一再發生的衝突事件，回答他／她面對該事件當時，他／她覺得會造成六種傷害的程度大小，在 0 (全無傷害) 到 3 (非常大傷害) 的李克特 (Likert) 四點量表中，選擇一個數字代表會造成每一種傷害的主觀感覺程度。分數愈高表示主觀感覺的壓力愈大或主觀感覺的嚴重性愈高。

問題二與問題四係有關受試者對婚姻衝突的次級評估 (可控制程度)。問題二要求受試者針對他／她所描述的一再發生的衝突事件，回答他／她面對該事件當時，他／她覺得自己能控制或改變該壓力情境使之好轉的程度如何，在 0 (完全無法控制) 到 8 (完全可以控制) 的九點評量表中選擇一個數字代表主觀感覺的可控制程度。選擇的數字愈大表示主觀感覺的可控性愈高。問題四要求受試者針對他／她

們所描述的一再發生的衝突事件，回答他／她面對該事件當時，他／她有四種想法以應付該事件的同意程度，在 0（完全不同意）到 3（完全同意）的李克特（Likert）四點量表中，選擇一個數字代表對每一種想法的同意程度。分數愈高表示主觀感覺的可控制性愈高。

婚姻適應量表（Marital Adjustment Inventory）

本量表係譯自 Locke 和 Wallace（1959）所編的 Locke-Wallace 婚姻適應量表（Marital Adjustment Test）。本量表係評估受試的婚姻滿意程度。本量表已被證明是評量婚姻適應的有效與可靠的工具。折半信度是 .90，同時，它可以很有效的用來區辨有美滿婚姻的受試與婚姻有挫折的受試（Locke & Wallace, 1959）。由本量表所測得的分數與由客觀觀察婚姻互動的結果有正向的顯著相關（Gottman, Markman, & Notarius, 1977）。在臨床上使用本量表時傾向於計算一個整體分數。本量表的計分方式，每題的每個選項有不同的加權分數，將每題的反應加權分數累加起來即為整體分數，分數愈高表示婚姻滿意度愈高。在使用上，一般以 100 為二分的臨界點，100 以上表示婚姻滿意，100 分以下表示婚姻關係有壓力存在。在本研究中，受試的婚姻滿意程度除了由整體分數表示以外，另由本量表第 2 題中受試所評估八種事項，表示他／她們與配偶在此八種事項中彼此意見相同或不相同的程度，計算出一個分數來表示。對每一種事項彼此意見相同或不相同的反應以六點李克特（Likert）量表來計分，由 6（總是同意）到 1（總是不同意）。這個分數稱之為生活意見相同程度，分數愈高表示婚姻滿意度愈高。另外，由本量表第 11, 13 與 15 題的反應中又計算出一個分數。每題的四個選項得分由 0 到 3 計分，如第 13 題的反應，如果是選擇時常希望有結婚以 3 分計，如果是選擇從沒希望有結婚以 0 分計。這個分數稱之為婚姻承諾，分數愈高表示婚姻滿意度愈高。因此，由受試者對婚姻適應量表的反應，本研究得到婚姻滿意整體分數、生活意見相同程度與婚姻承諾三個婚姻滿意程度的指標。

社會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Inventory）

本量表係譯自 Sarason, Sarason, Shearin 和 Pierce（1987）所編的簡式社會支持問卷（brief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SSQ6）。簡式社會支持問卷係由 27 題的社會支持問卷（SSQ）（Sarason, Levine, Basham, & Sarason, 1983）所簡化而來。由對此問卷的回答可以得到社會支持的可獲得性（social support availability）與社會支持的滿意度（social support satisfaction）二個分數。社會支持問卷已被證明是良好的心理計量工具。隔四週的再測結果發現，社會支持的可獲得性與社會支持的滿意度的再測信度分別是 .90 與 .83，同時此二分數與憂鬱與

焦慮有顯著的負相關 (Sarason, et al., 1983)。簡式社會支持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係數是 .90 (社會支持的可獲得性) 與 .93 (社會支持的滿意度)，而此二分數與一些人格或社會勝任能力的相關與SSQ所測得此二分數與相同人格或社會勝任能力的相關有相似的結果 (Sarason et al., 1987)。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SSQ與SSQ6的問題都與情緒支持有關，因此他們只能用來評量個人的情緒支持程度，至於其他方面的支持則無法評量。

在本量表中，有六個問題，每一個問題有二個部份。第一部份請受試回答當他／她面對前面在對婚姻因應量表反應所描述的一再發生衝突、爭吵的事件時，他／她認為會協助或支持他／她的人的姓名。可以只回答他／她的名或他／她與受試的關係，每一個問題最多只能列出九個人。由受試所回答的人數可以得到社會支持可獲得性分數。第二部份，請受試在6點評定量尺上回答一個數字，該數字代表受試感覺面對該事件時，他／她對自己所得協助或支持的滿意或不滿意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到社會支持的滿意度分數。社會支持可獲得性與社會支持的滿意度愈高表示社會支持的程度愈高。

三、資料分析

係以 Oneway 共變數分析 (analysis of covariance) 用來探討在統計控制與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有關的因素後，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年齡與性別差異。在年齡差異的分析中，獨變項是年齡群，有年輕成年人、中年人與老年人三個群體，依變項是每一種婚姻衝突因應行為，而與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有顯著關係的其他變項為共變量 (covariate)。在性別差異的分析中，獨變項是性別，有男、女二個群體，依變項是每一種婚姻衝突因應行為，而與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有顯著關係的其他變項為共變量 (covariate)。

參、結果

一、婚姻衝突因應行為與人口統計變項的關係

為探討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與人口統計變項的關係，研究以二種不同的統計方式進行。屬於名義計量 (nominal scale) 的人口統計變項進行 oneway 變異數分析，探討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是否呈現差異。屬於次序計量 (ordinal scale)、間距計量 (interval scale) 或比率計量 (ratio scale) 的人口統計變項則進行它們與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積差相關分析。

人口統計變項中的職業、配偶職業、宗教信仰、配偶的宗教信仰屬於名義變項，經過 oneway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發現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在職業、宗教信仰、配偶宗教信仰三變項上並沒有呈現顯著的差異，但在配偶職業變項中爭執 ($F(9, 291)=3.35, p<.001$)、正向解決 ($F(9, 290)=2.62, p<.01$) 與尋求社會支持 ($F(9,290)=3.90, p<.001$) 三因應行為呈現顯著差異。經過Scheffe考驗發現配偶從事商業工作的人 ($M=1.96, N=58$) 比配偶退休者 ($M=1.55, N=55$) 採取較多爭執的因應行為；配偶從事家管工作者 ($M=3.08, N=60$) 比配偶退休者 ($M=2.45, N=55$) 採取較多正向解決的因應行為；配偶從事商業工作的人 ($M=2.09, N=58$) 比配偶退休者 ($M=1.49, N=55$) 採取較多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

除了以上四種名義計量的人口統計變項外，其他的人口統計變項與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積差相關如表二所示。

表二 婚姻衝突因應行為與次序計量、間距計量和比率計量的人口統計變項的相關

	逃避	爭執	正向解決	自我責難	自我興趣	尋求社會支持
性別	.04	.17*	-.25**	.11	-.19*	.10
年齡群	.16*	-.25**	-.19*	-.15*	-.01	-.27**
年齡	.17*	-.25**	-.23**	-.15*	.02	-.26**
配偶年齡	.19*	-.18*	-.31**	-.10	-.06	-.19*
受教育年數	-.14	.07	.34**	.05	.21**	.18*
配偶受教育年數	-.04	.19*	.10	.10	-.02	.19*
結婚年數	.17*	-.20**	-.27**	-.09	-.06	-.23**
婚姻狀況	-.07	-.01	-.02	.02	.02	.01
配偶婚姻狀況	-.03	-.15*	-.12	-.06	-.08	-.06
擁有子女數	.04	-.13	-.11	-.06	-.01	-.09
是否接受過婚姻輔導	.07	-.03	-.03	-.05	.15*	.02
健康狀況	.29**	.12	-.18*	.29**	.04	-.04
全家年平均收入	-.15*	.01	.21**	-.02	.02	.12

年齡群：1代表年輕成年人，2代表中年人，3代表老年人。

婚姻狀況：1代表第一次結婚，2代表第二次結婚，3代表第三次結婚。

是否接受過婚姻輔導：1代表是，2代表否。

健康狀況：1代表優良，2代表好，3代表尚可，4代表不好。

全家年平均收入：1代表20萬元以下，2代表20萬元-40萬元，3代表40萬元-60萬元，
4代表60萬元-80萬元，5代表80萬元-100萬元，6代表100萬元-150萬元，
7代表150萬元-200萬元，8代表200萬元以上。

N=262.

* $p<.05$. ** $p<.01$.

性別和年齡群與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關係將在後面詳細說明。由表二中可以看出配偶的年齡愈大，受試傾向於採取較多逃避的因應行為，但採取較少爭執、正向解決與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受試者的受教育年數愈多，傾向於採取較多正向解決、自我興趣與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配偶的受教育年數愈多，受試傾向於採取較多爭執與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結婚愈久，受試傾向於使用較少爭執、正向解決與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但採取較多逃避的因應行為。配偶結婚愈多次，受試傾向於採取較少爭執的因應行為。曾經接受過婚姻輔導的受試傾向於採取較多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受試的健康狀況愈差則傾向採取較多逃避與自我責難的因應行為，但使用較少正向解決的因應行為。受試的全家平均年收入愈多則傾向於採取較多正向解決的因應行為，但使用較少逃避的因應行為。

人口統計變項中與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有顯著關係的變項在後面探討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年齡與性別差異中將視之為共變量，排除其對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影響以探討年齡與性別對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淨效果。人口統計變項中與逃避因應行為有關係的是年齡、配偶年齡、結婚年數、健康狀況與全家年平均收入；與爭執因應行為有關係的是年齡、性別、配偶職業、配偶年齡、配偶受教育年數、結婚年數與配偶婚姻狀況；與正向解決因應行為有關係的是年齡、性別、配偶職業、配偶年齡、受教育年數、結婚年數、健康狀況與全家年平均收入；與自我責難因應行為有關係的是年齡與健康狀況；與自我興趣因應行為有關係的是性別、受教育年數與是否接受過婚姻輔導；與尋求社會支持有關係的是年齡、配偶年齡、受教育年數、配偶受教育年數與結婚年數。

二、婚姻衝突因應行為與其他研究變項的關係

本研究的研究變項包括婚姻衝突因應行為、人格特質、婚姻衝突情境的認知評估、婚姻滿意程度與社會支持。表三列出五個研究變項的交互相關係數（intercorrelation coefficient）。由此表可以得知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與其他四個研究變項的關係。逃避的因應行為與精熟性、自我尊嚴、樂觀性、婚姻滿意整體分數、生活意見相同程度與婚姻承諾有顯著相關。個人的人格特質愈正向、婚姻滿意程度愈高則採取較少逃避的因應行為。爭執的因應行為與精熟性、嚴重性的評估(-)、可控制性的評估(-)、嚴重性的評估(-)、婚姻滿意整體分數、生活意見相同程度、婚姻承諾與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有顯著相關。個人有愈高的精熟性、對婚姻衝突情境的評估愈正向、婚姻滿意程度愈高與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愈高則採取較少爭執的因

應行為。正向解決的因應行為與精熟性、自我尊嚴、樂觀性、可控制性的評估(-)、可控制性的評估(=)、婚姻滿意整體分數、生活意見相同程度、婚姻承諾與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有顯著相關。個人有較正向的人格特質、對婚姻衝突情境的可控制性評估愈高、婚姻滿意程度愈高與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愈高則採取較多正向解決的因應行為。自我責難的因應行為與精熟性、自我尊嚴、樂觀性、嚴重性的評估(-)、可控制性的評估(-)、嚴重性的評估(=)、婚姻滿意整體分數、生活意見相同程度、婚姻承諾與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有顯著相關。個人的人格特質愈正向、婚姻滿意程度愈高、對婚姻衝突情境的評估愈正向與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愈高、則採取較少自我責難的因應行為。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與自我尊嚴、嚴重性的評估(=)、可控制性的評估(=)、婚姻滿意整體分數、生活意見相同程度與婚姻承諾有顯著相關。個人有較低的自我尊嚴、婚姻滿意程度愈高則採取較少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與嚴重性的評估(-)、嚴重性的評估(=)與可控制性的評估(=)有顯著相關。個人對婚姻衝突情境的評估愈嚴重則採取較多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

研究變項中與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有顯著相關的變項在後面探討婚姻衝突因應行為之年齡與性別差異中也視之為共變量，排除其對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影響以探討年齡與性別對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淨效果。

三、婚姻衝突因應行為之年齡與性別差異

Oneway 共變數分析 (analysis of covariance) 用來探討在統計控制與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有關係的變項後，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之年齡與性別差異。在年齡差異的探討中，獨變項是年齡群，有年輕成年人 (25-45 歲)、中年人 (45-65 歲) 與老年人 (65 歲以上) 三個群體；在性別差異的探討中，獨變項是性別，有男、女二個群體。在年齡與性別差異探討中，依變項是每一種婚姻衝突因應行為，而與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有顯著關係的人口統計變項與研究變項為共變量 (covariate)。其結果如表四與表五所示。由表四可以得知自我責難 ($F(2, 288)=3.76, p<.05$) 與自我興趣 ($F(2, 286)=7.25, p<.01$) 的因應行為有顯著的年齡差異。年輕成年人比老年人採取較多自我責難的因應行為，但使用較少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由表五可以得知爭執 ($F(1, 287)=8.03, p<.01$) 與自我興趣 ($F(1, 288)=5.06, p<.05$) 的因應行為有顯著的性別差異。女性比男性採取較多爭執的因應行為，但使用較少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

表三 研究變項的交互相關係數

	精熟性	自我尊嚴	樂觀性	嚴重性的評估(-)	可控性的評估(-)	嚴重性的評估(+)	可控性的評估(+)	婚姻滿意整體分數	生活意見相同程度	婚姻承諾	社會支持的可獲得性	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	正向解決	尋求社會支持	逃避	爭執	自我責難	自我興趣
人格特質	1.00																	
精熟性		.53**	1.00															
自我尊嚴			.48**	.67**	1.00													
樂觀性																		
婚姻衝突情境的認知評估																		
嚴重性的評估(-)																		
可控性的評估(-)																		
嚴重性的評估(+)																		
可控性的評估(+)																		
婚姻滿意程度																		
婚姻滿意整體分數																		
生活意見相同程度																		
婚姻承諾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的可獲得性																		
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																		
婚姻衝突因應行為																		
正向解決																		
尋求社會支持																		
逃避																		
爭執																		
自我責難																		
自我興趣																		

N=270.
*p<.05. **p<.01.

表四 控制顯著相關變項後，各年齡層在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調整平均數與標準差及F考驗

	<u>年輕成年人</u>		<u>中年人</u>		<u>老年人</u>		F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逃避	2.91	.49	3.07	.47	2.93	.58	2.93a
爭執	1.76	.52	1.76	.46	1.76	.51	0.01a
正向解決	2.62	.65	2.89	.73	2.96	.81	2.34b
自我責難	2.26	.52	2.16	.59	2.02	.60	3.76*c
自我興趣	2.29	.51	2.55	.64	2.61	.75	7.25**a
尋求社會支持	1.91	.72	1.87	.74	1.62	.52	1.18a

aF(2,286). bF(2,284). cF(2,288).

*p<.05. **p<.01.

表五 控制顯著相關變項後，男女性在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調整平均數與標準差及F考驗

	<u>男 性</u>		<u>女 性</u>		F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逃避	3.02	.50	2.91	.55	1.67a
爭執	1.69	.48	1.84	.53	8.03**b
正向解決	2.87	.70	2.77	.76	1.47c
自我責難	2.13	.50	2.17	.63	.77d
自我興趣	2.56	.61	2.40	.65	5.06*e
尋求社會支持	1.73	.68	1.88	.71	1.70a

aF(1,286). bF(*1,287). cF(1,285). dF(1,289). eF(1,288).

*p<.05. **p<.01.

肆、結論與討論

以往的研究在探討因應行為的年齡或性別差異時往往忽略其他與因應行為有關因素的可能影響而無法得到年齡或性別對因應行為影響的淨效果。經過統計控制與個別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有關係的人口統計變項與其他的研究變項後，本研究結果發現年輕成年人比老年人採取較多自我責難的因應行為，但使用較少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女性比男性採取較多爭執的因應行為，但使用較少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

當面對婚姻有衝突的情境時，老年人比年輕成年人傾向於使用較多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這個結果與筆者以美國成年人為研究對象所得到的結果（Lee, 1995）相一致。老年人當面對婚姻衝突時比年輕成年人較會獨自從事自己有興趣的活動以減輕婚姻衝突時所產生的壓力，這結果基本上支持撤離理論（disengagement theory），該理論指出老年人會漸漸的與外在世界隔離，生活在較為個人內在的世界（Cumming & Henry, 1961）。年輕成年人當面對婚姻衝突情境時比老年人較會表現出憂慮、自責、煩惱與睡眠或健康的困擾行為，這結果可能是由於年輕成年人的情緒比較容易受到婚姻關係好壞的影響，當婚姻關係中有衝突事件發生時，國內年輕成年人比老年人較擔心婚姻關係會惡化，因而較可能以自我責備的方法來處理衝突事件所產生的壓力，以免衝突事件更加惡化。本研究所發現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年齡差異部份支持因應行為發展的觀點，但也說明了因應行為的發展方向並不是單朝向更積極的因應方式或單朝向更消極的因應方式，而是有些因應方式朝向更積極的方向發展（如少自我責難），但有些因應方式朝向更消極的方向發展（如多自我興趣）。

國內已婚男性當面對婚姻衝突情境時比已婚女性較會採取單獨從事家庭以外自己有興趣的活動以減輕衝突時所產生的壓力。這個現象可能是由於國內已婚女性的日常活動大多以家庭為生活重心，因而比已婚男性不易發展出家庭外自己有興趣的活動。如此，當面對婚姻衝突時，已婚男性比已婚女性較會有家庭以外的活動可從事，以暫時逃避氣氛不和諧的家庭。當面對婚姻衝突情境時，女性比男性傾向於使用較多爭執的因應行為，這個結果與筆者以美國成年人為研究對象所得到的結果（Lee, 1995）相一致。已婚女性在面對婚姻衝突時比已婚男性會反應出繼續衝突、批評、諷刺與報復的行為，這似乎反映出傳統文化結構中夫妻衝突時「要求—退縮」（demand-withdraw）互動模式（Gottman & Krokoff, 1989；Markman & Kraft, 1989）所造成的結果。已婚女性在夫妻衝突中比較在乎夫妻關係的改善、和解，要求丈夫把事情解釋清楚或做出承諾，但已婚男性卻傾向於以逃避、退縮、不理會的

方式（如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來因應太太的要求，如此將使已婚女性發展出強烈的情緒訴求。本研究所發現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性別差異說明了國內已婚男性當面對婚姻衝突時比已婚女性會反應出我行我素的行為，也因此使得已婚女性容易採取不甘罷休、力爭到底的情緒反應行為。這二種婚姻衝突的因應行為都可能會傷害婚姻品質。

在探討人口統計變項與各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關係時，本研究發現一些有意義的結果。已婚成年人的教育程度愈高傾向採取較多正向解決、尋求社會支持與自我興趣的因應行為。結婚愈久的成年人傾向於使用較少爭執、正向解決與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健康狀況愈差的已婚成年人傾向於採取較多逃避與自我責難的因應行為，但使用較少正向解決的因應行為。全家收入愈多的已婚成年人傾向於採取較多正向解決的因應行為，但使用較少逃避的因應行為。綜合以上的結果可以看出高學歷、健康狀況良好、收入高的年輕成年人應該是最能有效的、積極的處理婚姻衝突問題的專家。

有關本研究的限制，首先是關於本研究結果類化的問題。本研究的受試樣本取樣於大台北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根據受試的全家年平均收入、教育程度與職業綜合評估，受試樣本係屬中產階級，大多數的受試皆是第一次結婚，身體狀況良好，宗教信仰以佛教、基督教與無信仰居多，受試反應所針對的婚姻衝突情境大多屬於小孩教養的衝突（28.2%）、生活習慣不同的衝突（13.3%）與家事分配不均的衝突（12.0%）。因此，本研究結果的類化應小心考慮受試樣本與婚姻衝突情境的同質性。

再次是有關本研究因應行為測量的問題，在本研究中要求受試者回憶自己所經驗到的嚴重且經常發生的衝突情境，評估該衝突情境的因應行為，如果受試不依指導語去回憶衝突情境或無法回憶出衝突情境，那麼他們對因應方式的評估將只是反應出他們一般性的婚姻溝通方式，而不是評估針對某一特定婚姻衝突情境所表現出的特殊因應行為。相同的，受試者對衝突情境的可控制性與嚴重性的評估將只是反應出他們對婚姻品質的評估與內外控特質的自我評估。

如何正確的評估受試者使用各種婚姻衝突因應行為的程度是未來研究必須考慮的問題。自我報告的測量方式往往會使測量的結果失去真實性，尤其是像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方式的測量，受試者可能為了面子問題或其他原因，對真實因應行為的回答有所隱瞞。為了克服這個問題，同時以實際觀察法或由受試者的重要他人得到受試者因應行為的資料或許可以用來驗證受試者對因應行為回答的真實性。基於個人對不同壓力情境會採取不同因應行為的現象（Lazarus & Launier, 1978；McCrae,

1982) , 一個未來研究可以考慮改善的方向是在測量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時可以把婚姻衝突的情境限定於某一特定壓力事件上, 如子女教養方式不一致的衝突事件或生活價值觀不同的衝突事件。

參考書目

- Billings, A. G., & Moos, R. H. (1981). The role of coping responses and social resources in attenuating the impact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4, 139-157.
- Bowman, M. L. (1990). Coping effort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Measuring marital coping and its correlat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463-474.
- Cantor, N., & Kihlstorm, J. F. (1987). *Personalit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NJ: Prentice.
- Carver, C. S., Scheier, M. F., & Weintraub, J. K. (1989). Assessing coping strategies: A theoretically 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267-283.
- Costa, P. T. Jr., & McCrae, R. R. (1988). Personality in adulthood : A six 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lf-reports and spouse ratings in the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853-863.
- Costa, P. T. Jr., & McCrae, R. R. (1989). Personality continuity and the changes of adult life. In P. T. Costa, Jr., M. Gatz, B. L. Neugarten, T. A. Salthouse, & I. C. Siegler (Eds.), *The adult years: Continuity and change* (pp.45-77).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Costa, P. T. Jr., Zonderman, A. B., & McCrae, R. R. (1991). Personality, defense, coping, and adaptation in older adulthood. In E. M. Cummings, A. L. Greene, & K. H. Karraker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stress and coping* (pp.277-293). Hillsdale, NJ: Erlbaum.
- Cumming, E., & Henry, W. (1961). *Growing old: 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Elliott, D. J., Trief, P. M., & Stein, N. (1986). Mastery, stress, and coping in marriage among chronic pain patien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9, 549–558.
- Endler, N. S., & Parker, D. A. (1988). *The measurement of cop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Coping Inventor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o. 174,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 Endler, N. S., & Parker, D. A. (1990).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coping: A critical eval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844–854.
- Feifel, H., & Strack, S. (1989). Coping with conflict situations: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en. *Psychology and Aging*, 4, 26–33.
- Fleishman, J. A. (1984).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oping pattern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5, 229–244.
- Folkman, S. (1984). Personal control and stress and coping process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839–852.
- Folkman, S., & Lazarus, R. S. (1980). An analysis of coping in a middle-aged community sampl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1, 219–239.
- Folkman, S., & Lazarus, R. S. (1985). If it changes it must be a process: A study of emotion and coping during three stages of a college exami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150–170.
- Folkman, S., Lazarus, R. S., Gruen, R. J., & DeLongis, A. (1986). Appraisal, coping, health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571–579.
- Folkman, S., Lazarus, R. S., Pimley, S., & Novacek, J. (1987). Age differences in stress and coping processes. *Psychology and Aging*, 2, 171–184.
- Folkman, S. (1991). Coping across the life-span: Theoretical issues. In E. M. Cummings, A. L. Greene, & K. H. Karraker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stress and coping* (pp. 3–

- 19). Hillsdale, NJ: Erlbaum.
- Fondacaro, M. R., & Moos, R. H. (1987).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5*, 653-673.
- Freud, A. (1946).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Gottman, J. M., Markman, H. J., & Notarius, C. I. (1977). The topography of marital conflict: A sequential analysis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behavi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9*, 461-477.
- Gottman, J. M., & Krokoff, L. J. (1989). Marital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A longitudinal view.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 47-52.
- Guttman, D. L. (1974). The country of old men: Cross-cultural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later life. In R. L. Levine (Ed.),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Contemporary readings*. Chicago: Aldine.
- Haan, N. (1977). A tripartite model of ego functioning: Values and clinical research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48*, 14-30.
- Holahan, C. J., & Moos, R. H. (1987).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cop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946-955.
- Ilfeld, F. W. Jr. (1980). Understanding marital stressors: The importance of coping style.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6*, 375-381.
- Irion, J. C., & Blanchard-Fields, F. (1987). A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 of adaptive coping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2*, 502-504.
- Labouvie-Vief, G., Hakim-Larson, J., & Hobart, C. J. (1987). Age, ego level, and the life-span development of coping and defense process. *Psychology and Aging, 2*, 286-293.
-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4).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 Lazarus, R. S., & Launier, R. (1978). Stress-related transactions between person and environment. In L. A. Pervin & M. Lewis (Eds.),

- Perspectives in interactional psych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Lee, L. J. (1993). *Determinants of coping behaviors in marital conflict situations across adulthoo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 Lee, L. J. (1994). Personal, social support, and marital variables related to marital cop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17, 391-424.
- Lee, L. J. (1995).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marital coping behavio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70, 117-134.
- Locke, H. J., & Wallace, K. M. (1959). Short marital-adjustment and prediction tests: Thei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21, 251-255.
- Magnusson, D., & Endler, N. S. (1977). *Personality at the crossroads*. Hillsdale, NJ: Erlbaum.
- Markman, H. J., & Kraft, S. A. (1989). Men and women in marriage: Dealing with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rital therapy. *Behavior Therapist*, 12, 51-56.
- Menaghan, E. (1982). Measuring coping effectiveness: A panel analysis of marital problems and coping effor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3, 220-234.
- Menaghan, E. (1983). Individual coping efforts and family studies: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6, 113-135.
- McCrae, R. R. (1982). Ag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coping mechanism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7, 454-460.
- McCrae, R. R. (1989). Ag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the use of coping mechanism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4, 161-169.
- McCrae, R. R., & Costa, P. T. Jr. (1986). Personality, coping, and coping effectiveness in an adult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4, 385-405.
- Pearlin, L. I., & Schooler, C. (1978). The structure of coping.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 2-21.
- Pfeiffer, E. (1977). Psychopathology and social pathology. In J. E. Birren

- & K. W. Schaie (Eds.), *Handbooks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Quayhagen, M. P., & Quayhagen, M. (1982). Coping with conflict: Measurement of age-related patterns. *Research on aging*, 4, 364-377.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erg, M. (1979). *Conceiving the self*. New York: Basic Books.
- Sarason, I. G., Levine, H. M., Basham, R. B., & Sarason, B. R. (1983). Assessing social support: The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127-139.
- Sarason, I. G., Sarason, B. R., Shearin, E. N., & Pierce, G. R. (1987). A brief measure of social suppor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4, 497-510.
- Scheier, M. F., & Carver, C. S. (1985). Optimism, coping, and health: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lized outcome experiences. *Health Psychology*, 4, 219-247.
- Siegler, I. C., George, L. K., & Okun, M. A. (1979). Cross-sequential analysis of adult personal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 350-351.
- Stone, A. A., & Neale, J. M. (1984). New measure of daily coping: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892-906.
- Thoits, P. A. (1986). Social support as coping assistanc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416-423.
- Vaillant, G. E. (1977). *Adaptation to life*. Boston: Little, Brown.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Marital Coping Behaviors Of The Married In Taipei Area

Liang-jei Le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marital coping behaviors.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 was administered to a sample of 301 married adult residents (110 young adults, 90 middle-aged adults, 101 old adults; 150 males, 151 females) of Taipei area. Subjects were interviewed with Marital Coping Inventory to report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used a variety of marital coping behavior when they encountered the most serious recurring marital conflict and a set of scales.

After statistically controlling the influences of variable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 marital coping behavior, Oneway ANCOVA was employed to examine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marital coping behaviors. The results showed (1) Young adult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self-blame marital coping behavior and less likely to use self-interest marital coping behavior than old adults, (2) Women show greater use of conflict marital coping behavior and less use of self-interest marital coping behavior than men.

Key words : Marital coping behavior, Marital conflict appraisal, Social support, Marital satisfaction, Age differences, Sex differences